

志

东周列国

【明】冯梦龙·编
【清】蔡元放·评



岳麓书社

东周列国志

〔明〕冯梦龙·编

〔清〕蔡元放·评

竺少华·点校

岳麓书社

点 校 竺少华
责任编辑 管巧灵
 潘运告
封面设计 胡 颖

东周列国志

〔明〕冯梦龙编

〔清〕蔡元放评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河西新民路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90年4月第1版 1995年6月第7次印刷

字数：910,000 印张：27.875 印数：172,601—212,600

ISBN7-80520-192-7/I·106

定价：（平）18.30元 （精）21.80元

【湘新登字 007.号】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前 言

《东周列国志》叙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五百多年间的历史，全书一百另八回，刊印于明末，是当时出现的一系列历史演义小说中流传较广、影响较大的一部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最早讲述列国故事的当推宋、元话本，如《七国春秋平话》、《秦并六国平话》等。到明代嘉靖、万历年间，有福建建阳县人余邵鱼，继承话本成果，删去其中严重与史实不合的情节，也掺杂一些如“苏妲己驿堂被诛”、“穆王西游昆仑山”等民间传说，从妲己驿堂被诛，至秦统一天下，较全面地记载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，编写了《列国志传》（一名《春秋列国志传》，共八卷，二二六节，二十七八万字，刊于明嘉靖、隆庆间。今传世有八卷本和十二卷本二种）。以后，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（字犹龙，即墨愁氏。1574——1646）在此书基础上进行改写，扩充到一〇八回，近七十万字。在增补中，冯氏发现“旧志事多疏漏”，“兼以率意杜撰”，便把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诸史传作为依据，对“凡国家之兴废存亡，行事之是非成毁，人品之好丑贞淫，一一胪列”，而删去了旧作中没有依据、凭空设想的情节。经过重新增删、更改、编次的《新列国志》，则比《列国志传》更符合史实。如“秦哀公临潼斗宝”故事，冯梦龙予以删节，是因为秦哀公之世，“秦方式微”，“南附于楚”，不可能号召十七国君主同赴临潼斗宝，如果保留下来，会前后失去照应，互相抵牾，不合情理。但冯氏在剔除了“杜撰而不顾是非”的幻想虚构成分后，进行了某些创造，如高渐离以筑击秦王乃秦王中年事，为使故事连贯便提前了。这样处理，做到“事真而列国理不质”，使作品更符合历史真实。清乾隆时代，又有秣陵蔡元

放(名昇,别号七都梦夫、野云主人)把《新列国志》略加修订润色,并加了不少评语和夹批、夹注,改名为《东周列国志》,于乾隆年间刊行,成为后来最通行的本子。

公元前七七〇年,犬戎又起不义之师,大举入侵周疆,岐、丰之地,半被戎兵占领,渐渐逼近镐京,势甚猖獗。周平王不采取积极的御敌之策,也不听谋臣的劝阻,断然决定东迁洛邑,西周遂亡,周室从此失去控制诸侯的力量,王朝日趋衰落。《东周列国志》第一回、第二回,可以说是故事的引子,自第三回起,直至第八十三回,充分叙述了春秋三百年间,各国诸侯连年战争,五霸先后兴起。但是诸侯兼并的结果,导致一些大夫乘时而起,逐渐夺取诸侯手中的权力,形成了强有力的家属势力,于是大夫间的鲸吞替代了诸侯兼并,从三家分晋标志着战国的开始,广泛描写了二百年左右的这一历史时期的故事。《东周列国志》就是在广阔的范围内,描写了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的兴亡盛衰,形象而生动地再现这一纷乱的历史。

但是“各相吞并裂封疆”的混乱而分裂的局面,如何“定于一”的呢?作者强调指出,不论是创立霸业或一统天下,关键是国君能否选拔贤士,排斥奸佞,改革政治,即所谓“总观千古兴亡局,尽在朝中用佞贤”。齐桓公能开创春秋霸业,就由于不记一箭之仇,拜管仲为相国。管仲省刑罚,薄税敛,发展盐铁,注重农商,他的“修理国政,立纲陈纪”的一整套富国强兵、爱民困霸的革新措施,使齐桓公才能奉天子以令诸侯,终成霸主。然而桓公当了霸主之后,雄心渐失,追求安乐,亲近奸佞,日离贤良,最后连命都葬送在易牙、竖刁一班小人手中,齐国的霸业遂寿终正寝。西秦地处西北,关河险固,攻守自如,少与中原相通。到了秦穆公即位,任用百里奚、蹇叔为左、右相,由余当谋臣,施行“立法教民,兴利除害”的改革政策,使秦国大治,称霸西戎,威震中原。而秦孝公也因为用人得当,由商鞅“变立新法,使秦国富强,天下莫比”,为秦始皇

统一中国打下基础。其他如楚成王任用子文为令尹，改革楚政，与开创春秋霸业的齐国抗衡；魏文侯任用西门豹为邺令，破除了“河伯娶妇”的旧俗；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，使楚国“雄视天下”等等，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托了作者的政治愿望。

作者在称颂明主贤臣的同时，也无情地揭露和鞭挞那些荒淫无耻、残酷暴虐的统治者，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、卫宣公筑台纳媳、卫懿公好鹤亡国、齐襄公兄妹淫乱、陈灵公袒服戏朝、楚灵王喜欢细腰、楚平王娶媳逐世子、晋灵公支解膳夫等。对臣子杀死这类暴君、昏君的举动，作者表示肯定和同情。如齐襄公之死，说是“恶贯已满”，罪有应得；齐懿公被弑，说是“国人方幸其死”；晋灵公死于非命，说是“百姓怨苦日久，反以晋侯之死为快，绝无一人归罪于赵穿”。作者还成功地塑造了“行仁义失众而亡”的宋襄公。宋襄公“德力俱无”，却一心求伯，硬要充当诸侯的盟主，听信了公子荡“借楚力以聚诸侯，复借诸侯以压楚”的权宜之计，结果堕入楚人的圈套，被执受辱，“似木雕泥塑一般，只多着二行珠泪”。这种愚蠢无能而又妄自尊大的丑态实在可笑。

在国与国的吞并，人与人的残杀时代，作者不惜笔墨，赞誉了那些舍生忘死、含垢忍辱、刚正不屈的忠臣义士。其中赵氏孤儿这个故事，着墨较多，用笔也细。春秋末期，晋景公听信奸臣屠岸贾之言，将赵氏满门抄斩。赵朔即将分娩的妻子庄姬是景公的姑母，入宫避祸，才死里逃生。未几庄姬分娩，生了个男孩，谎报女婴，并说出世不久死去。屠岸贾不信，入宫搜索，欲斩草除根，结果一无所获。程婴和赵氏另一门客公孙杵臼决计救孤，由杵臼把程婴的儿子抱往首阳山中，诈称赵孤，而程婴则到屠岸贾处告发。屠岸贾信以为真，亲率家丁赶往围捕杀死杵臼和假孤儿。与之同时，忠臣韩厥命人扮做草泽医生，入宫治病，盗出孤儿，将婴儿交付程婴。程婴指为己子，带同乳妇潜入孟山藏匿抚养。十五年后，晋悼公即位，拜韩厥为中

军元帅。韩厥乃私奏悼公，说明赵氏蒙冤真相。悼公传旨，接回孤儿，诛灭屠岸贾全族。程婴见赵氏已复官报仇，不忍公孙杵臼独死，遂自刎而亡。赵武请命于晋侯，把程婴与公孙杵臼同葬于云中山，谓之“二义冢”。这个故事说明了忠良必将压倒奸佞、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这一深刻的道理。

养士风气，始于春秋，盛于战国。战国时代四公子孟尝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、春申君，养士各在三千人以上。这些官僚贵族养士有着自己邀权固宠的目的，而在这些“士”中确有品德高尚、有真才实学的俊杰侠客。小说在冯欢弹铗、窃符救赵、合纵连横、鲁仲连义不帝秦等故事中，极力描写这些“士”善于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，发挥自己的善辩机变的才能，纵横捭阖，任侠尚武，赴汤蹈火，所作的事功在一时，名扬千古。

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几次著名战役的叙写，小说按照史实，旁采野史，十分成功地写出了战争的某些规律和特点。宋楚“泓水之战”，嘲讽了宋襄公在同强大的楚国作战中所持的那种夜郎自大的丑态，也批判了他这种“蠢猪式的仁义道德”。鲁齐“长勺之战”，说明了战前必须激励士气，熟悉地形，掌握敌情，等到敌军疲惫、我军气盛之时，开始出击，必能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。齐魏“马陵之战”，揭示了魏将庞涓兵败身亡马陵道，除了他的军事才能不如孙臆，另一个原因是他主观臆断和刚愎自用。而这些战争又都写得条理清晰，丰富多彩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功。尽管全书人物众多，头绪纷繁，但作者文心巧运，从史实中进行剪裁，突出重点，避免了一些演史小说枯乏无味的缺点。例如晋公子重耳出亡、吴越春秋、商鞅变法、孙庞斗志、合纵连横、冯欢弹铗、窃符救赵、荆轲刺秦王等较长的故事，都写得详情细腻，曲折生动。还有许多短小的故事，如千金买笑、掘地见母、假途灭虢、退避三舍、董狐直笔、绝缨大会、二桃杀三士、孙武演阵、卧薪尝胆、火牛破燕、纸上谈兵、毛遂自荐、甘罗早成

等，也写得有生有色，脍炙人口。

在塑造人物方面，作者根据春秋战国时期五六百年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的特点，从各个方面去刻画人物形象，包括霸主暴君、昏王佞臣、贤相良将、爱妃宠姬，直至义士勇夫、名儒说客、商贾优伶、烈女淫妇，大都写得有血有肉，形象鲜明。作者还主张“人不必有其事，事不必丽其人”，对描绘的人物进行高度艺术概括。如宋襄公的迂顽，晋灵公的暴戾，骊姬的阴险、晏平仲的机智，蔺相如的明理，南官长万的勇猛，魏犢的神勇，伍子胥的刚烈，孙臆的才略，庞涓的狂妄，程婴的仗义，冯欢的远谋，宰嚭的贪婪，吕不韦的卑劣等，都写得栩栩如生，入木三分。

作者还能够注意细节描写，如百里奚妻、弥明搏葵、秦嬴父率布三登逼阳城、二桃杀三士、鱼藏剑、西门豹乔送河伯妇、商鞅徙木立信、冯欢弹铗、范雎庭辱魏使、荆轲献地图等，都写得较为生动。第十八回曹沫劫齐侯一段，第一百二回朱亥出使一段，描绘得尤为精彩，引人入胜。

从艺术结构来看，全书故事时间漫长，人物众多，事件复杂，头绪纷繁，但作者做到紊而不乱，前后贯穿，上下衔接，宾主照应，布局严整。作者在敷衍这个历史时期所发生大大小小的故事时，能统筹全书，分清主次，运用实写或虚写、详述或略言、插叙或倒叙的手法，巧妙地使每个故事既有相对的独立性，故事与故事之间又环环勾连，蝉联而下，首尾浑成一体，从而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。这是本书在艺术方面的最成功之处，也是同时期其他历史小说所不能比拟的。

但《东周列国志》也并非完美无缺，不论是作品的思想性或艺术成就，都存在着某些缺陷。作者在叙写故事时，夹杂着不少神鬼迷信、因果报应、封建说教和忠义等糟粕。这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的局限性。尤其是对商鞅变法，作者虽然肯定了这一新法为秦国奠定了富国强兵的基础，但又说商鞅“法令虽行，

刑戮太惨”，“民间父子兄弟久含怨心”；而当他遭受“五牛分尸”惨祸时，竟说什么“百姓争啖其肉”，“岂非过刻之报乎”？更表现了作品思想上的弊病。

《东周列国志》这部在民间广为流传、颇有影响的历史小说，解放后惟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，可惜的是删去了所有的评语、夹评、夹注，以及序言、凡例、舆图、读法。如果我们能仔细研究一下蔡氏的种种评论，不难发现其中那些可贵的东西。如他把历史小说存在的价值，看作是有助于阅读正史。这看法虽有不够妥的一面，但也包含着正确的因素。还有对评点问题的议论，直至对每一事件或不同人物的评批中，积极、可取的东西也不少。至于那些注释部分，更有效了。出于这些原因，我们在整理这部享有盛誉的古典名著时，恢复《东周列国志》的原貌，便于人们阅读和研究。

自清乾隆以来，《东周列国志》流行甚广，刊本极多，有桐石山房藏板本、扫叶山房石印本、星聚堂本、义合斋本、森宝斋硃墨本等。尽管板本众多，却只有一个板刻的系统。从现有的资料来看，桐石山房藏板是最早的刻本。其第一册封面书题，左上端横刻“书业德”三字，下面单行直刻“东周列国全志”；扉页上端横刻“绣像新镌”，正面双行直刻“东周列国志全传”，又刻双行“桐石山房藏板”小字，右首直刻“秣陵蔡元放批评”，首页为“序”，末署“时乾隆十七年春月七都梦夫蔡元放氏题”，接着便是目录、读法、地图考、绣像。正文每册一卷，共二十三卷，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六字。共有绣像二十四幅。

这次整理以桐石山房藏板为底本，参校他本（包括《新列国志》），对书中明显的舛误，径自改正，不出校记；其余尽可能保持原貌，不敢擅改。

竺少华 谷鸣

一九八九年七月于上海

序

书之名，亡虑数十百种，而究其实，不过经与史二者而已。经所以载道，史所以纪事者也。《六经》开其源，后人踵增焉。训诂论议考辨之属，皆经之属也。鉴记纪传叙志之属，皆史之属也。顾《六经》者，圣人之书也。言体必有用，言用必有体。《易》与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经中之经也，而事亦纪焉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，经中之史也，而道亦彰焉。后人才识浅短，遂不得不岐而贰之，贰之斯不能不有所戾。故高谈名理者，常拙于博识之士，而自矜该洽者，其是非或谬于圣人。顾理无二致，故言道之书，虽世不乏著，究其精者，亦不过恢张馥蕴，仅可作佐翼注疏，其卑者糟粕唾余而已。若稍肆焉，则穿凿傅会，破碎支离之弊出矣。至于事，则不然，日新月异，千态万状，非圣人已然之书所能尽也。故经不能以有所益，而史则日以多。夫史固盛衰成败、废兴存亡之迹也。已然者事，而所以然者理也。理不可见，依事而彰，而事莫备于史。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报施，智愚、忠佞、贤奸之辨，皆于是乎取之，则史者可以翼经以为用，亦可谓兼经以立体者也。

自制举艺出，而经学遂涇。然帖括家以场屋功令故，犹知诵其章句。至于史学，其书既浩瀚，文复简奥，又无与于进取之途，故专门名家者，代不数人。学士大夫则多废焉置之，偶一展卷，率为睡魔所引耳。至于后进初学之士，若强以读史，则不免头岑岑，目森森，直苦海视之矣。《春秋》三《传》，《左氏》最为明备，专经者，犹或不能举其词，况其他乎！顾人多不能读史，而无人不能读稗官。稗官固亦史之支流，特更演绎其词耳。善读稗官者，亦可进于读史，故古人不废。

《东周列国》一书，稗官之近正者也。周自平辙东移，下迄吕政，上下五百有馀年之间，列国数十，变故万端，事绪纷纭，人物庞沓，最为棘目聱牙，其难读更倍于他史。而一变而为稗官，则童稚无不可得读，夫至童稚皆得读史，岂非大乐极快之事耶？然世之读稗官者颇众，而卒不获读史之益者何哉？盖稗官不过记事而已，其于智愚、忠佞、贤奸之行事，与国家之废兴存亡、盛衰成败，虽皆胪列其迹，而与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报施，智

愚、忠佞、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，及其所以盛衰成败、废兴存亡之故，固皆未能有所发明，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，方且懵焉昧之，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？夫既无与于学问之数，则读犹不读，是为无益之书，安用灾梨祸枣为！坊友周君，深虑于此，嘱予者屡矣。寅卯之岁，予家居多暇，稍为评骘，条其得失而抉其隐微。虽未必尽合于当日之指，而依理论断，是非既颇不谬于圣人，而亦不致遗唾于博识之士。聊以豁读者之心目，于史学或亦不无小裨焉。故既为评之，而复叙之如此。

时乾隆十七年春月七都梦夫蔡元放氏题

读 法

《列国志》与别本小说不同。别本多是假话，如《封神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》等书，全是劈空撰出。即如《三国志》，最为近实，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。《列国志》却不然，有一件说一件，有一句说一句，连记实事也记不了，那里还有工夫去添造。故读《列国志》，全要把作正史看，莫作小说一例看了。

《列国志》原是特为记东周列国之事。东迁始于平王，多事始于幽王。而本书却从宣王开讲者，盖平王东迁，由于犬戎之乱，犬戎之乱，由于幽王宠褒姒，立伯服，褒姒却从宣王时生根。且童谣亡国，亦先兆于宣王之世。故必须从他叙起，来历方得分明。此记事人倒树寻根之法，亦不得不然之理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一书，大率是靠《左传》作底本，而以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吴越春秋》等书足之，又将司马氏《史记》杂采补入。故其文字、笔气，不甚一样，读者勿以文字求之。

《列国志》因是杂采众书所成，故其事之详略，都是不得不然，当日作者不曾加意增减。若再加修饰一遍，便自然更是好看。而列国之事，是古今第一个奇局，亦是天地间第一个变局。世界之乱，已乱到极处，却越乱越有精神。周室之弱，已弱到极处，却弱而不亡，淹淹缠缠，也还做了两百年天子，真是奇绝。

周室卜世卜年，皆过其数。子孙虽已微弱之甚，而仍称其主，不至遽然亡灭。前人议论，有说周家忠厚开基，盛德之报；有说封建屏藩，互相维制之力。据我看来，两说都有些正，不可偏在一处讲。

由周而秦，是古今变动大枢纽。其变动却自东迁以后起，逐渐变来。其中世运之升降，风俗之厚薄，人情之淳漓，制度之改革，都全不相侔。子弟能细心考察，便是稽古大学问。

即如用兵一事，春秋是春秋之兵，战国是战国之兵，不消说是大相悬殊。即春秋中，齐桓与晋文，便有大段不同处。齐桓时用兵，还不过声罪取服，其究竟不过请成设盟而已。到晋文时，便动辄以吞并为事。这便是

世变大端中之一小变了。

齐桓时用兵，不过论百论千。到晋文时，兵便大盛，一战之际，常以万人。齐桓用兵，还是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。到晋文时，便多行诡计了。却也是到了那个时候，其势不得不然，正是天运改移处。若不然，便如宋襄一般，自取祸败了。

用兵之法，变化多端，用少用众，用正用奇，最是无可方物。唯有《列国志》中，却是无体不备。前人于《左传》中，集其用兵计谋，便谓兵谋兵鉴，已得要领，况又益之以战国若干战法乎。子弟理会得此等处，胸中平添无数兵法。《列国志》有益于子弟不少。

出使专对，圣人也说是一件难事。惟《列国志》中，应对之法最多，其中好话歹话，用软用硬，种种机巧，无所不备。子弟读了，便使胸中平添无数应对之法，真是有益于子弟不少。

金圣叹批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，便说于子弟有益。渠说有益处，不过是作文字方法耳。今子弟读了《列国志》，便有无数量学在内，此与《水浒传》、《西厢记》，岂可同日而语！

一切演义小说之书，任是大部，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，不过十数百数，事迹不过数十百件，从无如《列国志》中，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，盖其上下五百余年，侯国数十百处，其势不得不多，非比他书，出于撮凑。子弟读此一部，便抵读他本稗官数十部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人物情事虽千态万状，无所不有，却无神佛僧道、邪说妖言在内，便觉眼界中清静许多，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也有几处说鬼，却是从《左氏传》来，其说鬼处也还在理上，不与他处邪说同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有许多坏人，也有许多好人。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，坏人也有若干坏法。读者须细加体察，逐个自分出他的等第来，方于学问之道有益，不可只以“好坏”二字，囫圇过了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虽是也有好人，也有坏人，然毕竟是坏的多似好的，且好人又轻易不能全美。又多是各成其好，不甚相同。至于坏人做坏事，往往如出一辙。亦且穷凶极恶，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坏法都坏将出来，当时人君却偏偏欢喜坏人。若善恶同时，又往往好不胜坏。又不知是天意作兴恶人，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，真令人解说不出。

坏人明明作恶，还自好辨。偏是大奸大恶之人，他却偏会依附名义，

竟似与好人一般，在暗里行其险毒之计。这种人最是难认，观人者不可不知。

恶人依托名义，虽是可以感人，毕竟也有露马脚处，只是观者不审，便被他所骗耳，若明眼人自瞒不过。

大约看好人、坏人之法，只从“义利”二字上着眼，便可十得七八。贤奸之变，虽有万态，究其本，总不能外此两字而已。

“义利”二字不并立。天理看得重，爵禄身家看得轻，便是君子。若事只图自私自利，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险毒上去了，从何处还有天理来。

“义利”二字，其机甚微，到后来便有天渊之隔。即如臣弑君，子弑父，是天地间非常大变。然原其心，却不过从“利”上起耳。若肯将名位富贵看得轻，便自然没有此事了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篡弑之祸甚多。其臣为乱臣，子为贼子，罪不容诛，自不消说。然论世者，也要将那君父察勘一番，推求其所以到此之故。虽不以此而宽臣子之罪，却当以此垂戒为人君父者，使其有所畏惮。故圣人云：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”又云：“为人君止于仁，为人臣止于敬，为人子止于孝，为人父止于慈。”又云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诸如此类，不可胜数。大率都是互举。后世一切重责子臣，便似凡为君父便可恣肆为恶者，此是宋儒之偏，失圣人之意矣。

立子以嫡，无嫡立长，自是正理。废嫡立庶，废长立幼，于天理、人情自是不妥。然立庶立幼者，爱之也；爱之，必思所以安全之。今悖于情理而立之，后来便必致有杀夺之祸。不特富贵享不成，反连性命都送断了，又貽家国以覆乱之祸。其是非利害本自显然，却以私心所溺，遂去安从危，去利就害，自寻祸乱。《列国志》中，此等不可枚举。前车既覆，后车复然，甚有身与其祸，而到后来仍自蹈之者。此等愚人，真是愚得又可笑，又可恨，又可怜。

忠而见疑，信而得谤，自是常事。只看自己所处之地，与所遇之人何如耳。《列国志》中，此类甚多。其中有学有术、处之有方者，庶几自全。若只是一味自信，莽撞行去，个个身受其祸。如申生、叔武之类是也，读之令人时生学术不多之惧。子弟于此等处，须加意理会，万勿草草看过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有许多出于微贱，一时投契君心，遂得致位卿相，荣宠终身。如管仲、宁戚、百里奚、范雎等类，其胸中抱负经济，都是最上一流。只看他初见时，各有一番高识定论，足以深入人主之心。至其后来没

施，也都是条条件件，次次第第，上利君国，下益民生，可见不是一时取给口舌之便者然。若不是机缘凑巧，便也只好困穷草泽，沉埋一生了。天下万世，怀才抱艺而不得其时者，何可胜数，思之令人浩叹。

战国是游士之世。其游说之术，大都不甚相远。只是其中人品，却有优劣、邪正、高下之不同，读者须自出眼力分别之，莫作一列看了。

物莫不聚于所好。国君好贤，如齐桓便有管、宁等诸人，晋文则有狐、赵等诸人，魏文则有田、段等诸人。齐庄好勇，则有殖绰、郭最等诸人。夫力举千斤，射穿七札，亦难得之力，而一时便有多人。可见一切人材，只患求之不力耳，何患无材哉！有国家者，操用人之权而辄曰人材不足，吾不信也。

人主自中材以上，未有不极知国事之需贤其理者。然高爵厚禄，偏难以与君子，而易以与小人。及到有事之秋，却要贤能君子出力，却是急切没处去讨，遂有乏才之叹，岂不可笑。

贪人不顾天理，昧却良心，做上许多坏事，其意不过图终身受用耳。却不知坏却良心，依旧不得受用，枉落千口骂名，有何便宜处？乃前人跌倒，后人偏不晓得把滑，如《列国志》中，乱臣贼子接踵而起，餐餐嗜金，蛇蝎甘鸩，可胜浩叹！

圣人云：“性相近，习相远。”古谚云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”中材之主得贤臣，则可以贤君，与奸佞谗谄之人处，则陷于恶而不觉矣。《列国志》中诸君，大半是因臣下以为转移，而其名誉美恶，遂成千古话柄。

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”虽是两句熟话，却是亘古不易之言。试看《列国志》中，许多君相、卿士、大夫，起初任情径遂，不听好言；及到祸乱已成，身名已败，却才思想善言，自羞自恨，已无及了。吾愿普天下贤士大夫、读书学者与良朋密戚，逆耳言来，莫便愤然加怒，且将那言语细细详味一番，即使其言不是，于己亦无所损。倘事有可疑，理有足采，便可及时补救，免到后来懊悔也。

本书中批语议论，劝人着眼处，往往近迂，殊未必惬读者心。自然，若肯信得一二分，于事未必无当，便可算我批书人于看书人有毫发之益，不正如村警说弹词，仅可供一时之悦耳也。

教子弟读书常苦，大是难事。其生来便肯钻研攻苦、津津不倦者，是他天分本高，与学问有缘。这种人，于百中只好一二，其余便都是不肯读书的了。但若是教他读论道论学之书，便苦扞格不入。至于稗官小说，便

没有不喜去看的了。但稗官小说，虽好煞，毕竟也有不妥当处。盖其可惊可喜之事，文人只图笔下快意，于子弟便有大段坏他性灵处。我今所评《列国志》，若说是正经书，却毕竟是小说样子，子弟也喜去看，不至扞格不入。但要说它是小说，它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，子弟读了，便如把一部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都读熟了，岂非快事。

有人来说，《列国志》也不是全美之书，不可辄与子弟读。试问其故，则曰：其中夹有许多骄奢淫佚、丧心蔑理之事，恐子弟看了，引他邪心。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见，否则假道学及小儿强作解事者也。夫圣人之书，善恶并存，但取善足以为劝，恶足以为戒而已。他本小说，于善恶之际，往往不甚分明。其下者，则更铺张淫嫖，夸美奸豪，此则金生所谓其人可诛，其书可烧，断断不可使子弟得读者也。若《列国志》之善恶施报，皆一本于古经书，真所谓善足以为劝，恶足以为戒者，又何嫌于骄奢淫佚、丧心蔑理也哉！

他书亦讲报应，亦欲劝惩，但他书劝惩多是寓言，惟《列国志》中，件件皆是实事，则其劝惩为更切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繇词，其语甚古，亦甚验，不知当日所用是何古书，如何古法。自秦火后失传，殊令人恨恨。

《列国志》前后评语，悉是随手写去，更不曾重加点窜，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适处。盖我只是评其事理之是非，原无意于文字之工拙也。

《列国志》中，谬误甚多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，俱言宋襄夫人王姬，欲通公子鲍而不可。旧本乃谓其竟已通了。又说国人好而不知其恶，此事关系甚大，故不得不为正之。他如彗星出于北斗，主宋、齐、晋三国之君死难，本是周内史叔服之占，却作齐公子商臣使人占之。此类甚多，不能遍及也。

封建地图考

志称：禹会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成、汤之时，有三千餘国，武王观兵，有千八百国，东迁之初，尚存千二百国。迄获麟之末，二百四十二年，见于春秋经传者，惟百有餘国，而会盟征伐，章章可纪者，约十四君。其子男附庸之属，以及九州异裔，参错于列国中者，无不条分缕晰，考覆详明。胪列于后，以资博雅之大观，庶于輿图不无小补云耳。

鲁（都曲阜。见《禹贡·帝都注》。）

卫（都朝歌。见《商革命注》。戴公庐曹，今北直大名府滑县也。文公迁楚丘，今滑县东七十里废卫南县是。成公徙帝丘，亦曰濮阳，即大名府开州也。至元君徙野王而纪绝，野王今河南怀庆府附郭河内县是。）

齐（太公封营丘，今青州府临淄县。胡公薄姑，今青州府博兴县东北十五里薄姑城是。献公徙临淄，即太公营丘也。）

晋（叔虞封唐，今山西平阳府翼城县东二十五里唐城是。子懿徙晋，今太原府太原县是。穆侯徙絳，孝侯改絳为翼，亦曰故絳，今翼城县东南十五里古翼城是。景公迁新田，仍称絳，今平阳府絳州絳县是。）

宋（都商丘。见《商革命注》。）

郑（都新郑。今开封府禹州新郑县，又陕西西安府华州西北有故郑城，其始封邑也。）

陈（都宛丘。即开封府陈州。）

蔡（都上蔡。今河南汝宁府上蔡县。平侯徙新蔡。今汝宁府新蔡县也。昭侯徙州来，亦曰下蔡。今南直凤阳府寿州北三十里下蔡城是。）

曹（都曹。今兖州府曹州定陶县。）

许（都许。今开封府许州是。灵公迁叶，今南阳府裕州叶县。悼公迁夷，今凤阳府亳州东南七十里废城父县是。旋还叶，又迁于白羽，今南阳府邓州析川县是。许男斯又迁于容城，今荊州府